


历史文化与思考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化与思考/张巨成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1112-464-4

I. 历… II. 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418 号

历史文化与思考

张巨成 著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唐志成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刘云河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61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464-4

定 价: 30.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历 史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3
简评《剑桥中国晚清史》	
——对中国历史学的思考.....	(9)
护国战争中袁政府的经济波动	(15)
区域史研究的意义	
——评《近代滇史探索》	(24)
云南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与护国战争	
——兼谈对唐继尧的评价	(29)
修志应当上升到区域史研究的高度	(36)
再论修志应上升到区域史研究的高度	
——答黄忠源同志	(38)
抗日战争前中国是不统一的吗？	
——与刘大年先生商榷	(42)
论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45)
试论魏源对清朝时政的批评	(55)
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1941—1945 年)	(63)
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1945—1949 年)	(74)
楚图南与民盟	(84)
护国运动与云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94)
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新认识	(99)
20 世纪初留日学生的热门专业	(105)
论毛泽东的国防思想.....	(106)

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	(116)
飞鸟踪迹何处寻,雪泥鸿爪垂青史	(130)
要重视对云南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132)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	(135)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158)
中国共产党与“一二·一”运动.....	(167)
拨开“历史性的地域”之迷雾.....	(176)
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张居正.....	(180)
简论陈云的经济思想.....	(183)

教 育

更新大学理念,实行大学自治	(201)
应对危机,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205)

文 化

中国民俗文化的特色与整合.....	(217)
论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化.....	(222)
大学是什么?	(229)
也评孙中山的文化观	
——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231)
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	(237)
对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几点意见.....	(244)

政 治

讲政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51)
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权机关党的建设.....	(255)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认识.....	(261)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67)
党的先进性的内涵分析.....	(274)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云南	(281)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289)
弘扬长征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96)

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299)

跋..... (302)

历史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1985年12月)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动力。

—

历史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了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告诉我们在认识上要来一个飞跃：“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社会的历史正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过程的集合体、运动的集合体。它必然是处于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在这矛盾的运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是这样，阶级与阶级之间也是这样。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历史的发展始终都处在矛盾的运动状态中。“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

人类社会内部所包含的诸矛盾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在矛盾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他还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3]可见，历史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平衡的：有主有次，有领导有从属，有决定有服从。在人类社会的社会矛盾中，必

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主导性的作用。我们把这样的矛盾称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过程中的焦点，这个焦点放出的光芒照亮了历史。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总是带来了历史的巨变，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甚至使历史出现质变性的、飞跃性的大发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其他社会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那么，历史人物——推动了历史前进的那些人——必然是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并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人物。这也应当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毛泽东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關聯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4]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各不相同，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此一时期、此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彼一时期、彼一阶段则为社会次要矛盾；彼一时期、彼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此一时期、此一阶段则为社会次要矛盾。有转化就有发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经常出现的。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不断地出现矛盾，不断地解决矛盾，历史就是这样地发展。因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变化的。

二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力地证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是摆脱了周天子控制的诸侯国割据的时期，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剩下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七国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分裂割据严重地阻碍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各国之间的13次战争，杀人就达138.8万多人。每一场大战造成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①。同时，自春秋以来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民族以华夏族为中心逐渐融合，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统一

^① 《战国策·齐策五》。

已成为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由于这样的形势，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分裂和统一的矛盾。在这个时候，只有统一才能促进历史的发展，才能促进中国文明的发展。秦始皇顺应历史的潮流，抓住并解决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试问，如果秦始皇不致力于统一大业，而是大力发展秦国的经济生产，把发展生产力这个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处理，那么，秦能统一中国吗？年轻的秦王嬴政幸好没有中韩桓惠王的“疲秦”计策，不然，秦的统一事业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完成，甚至还有可能完不成统一大业。这个时候，生产力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在秦进行统一事业的时期，也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这个时期阶级矛盾并不是社会主要矛盾。

世界是运动的，历史是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贯穿始终的、固定不变的、唯一的历史发展动力。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动力。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的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或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5]

由于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在人与自然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表现，在内容、范围、形式上也不尽相同。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内容、性质、范围和形式上都根本不同，在这些社会形态的各自发展阶段上，其社会主要矛盾是经常变化转移的。人类正是不断地解决了他们所遇到的社会主要矛盾，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相互交错、经常变化的。宋、元、明、清各朝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经济繁荣时期。这又是什么力量推动它出现那样的经济繁荣呢？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在这些时期里，一般地说，都是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即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这些时期里已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了。在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的一段时期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革命的要求，相反，他们还感到新王朝的建立是对他们的一种“解放”，这种现象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

样：“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6]很明显，在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发展动力往往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即进行生产斗争。这个时候，人们对历史的伟大创造和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通过生产斗争的实践活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和前提下，人类自己才能得到解放，才能用物质力量去砸碎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价值、旧的思维方式、旧的行为方式、旧的情感方式，促进人类进入新的文明。

在新制度的上升阶段，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斗争。在这一点上，历史提供了大量例证。我国古代夏、商初期出现的生产发展情况，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都有力地说明，在新制度的上升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即对这些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17世纪上半期，在英国封建社会的母胎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起来了，不但在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而且在农业中还涌现出许多资本主义大农场。不但资产阶级成长起来，而且从贵族中间分裂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然而，英国当时仍旧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严重地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王室的矛盾。因此，摆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面前的任务，便是进行政治革命，改造国家政权，以解决上述社会主要矛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次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7]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688年威廉发动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已经过去。此后，英国政局相对稳定，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和内阁制逐步形成。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著名的产业革命，或称“工业革命”。它使英国从资本主义手工业生产过渡到了大机器生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解决了当时英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非常复杂的情况”^[8]。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9]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只有解决了这些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解决这些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活动，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近代中国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近代中国的实业（工业）的确非常落后，教育和科学文化也非常落后，但这些都没有构成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些人没有抓住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所以他们的救国主张行不通。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国的各阶级、各阶层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正是根据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中国共产党作了坚韧的努力和斗争，唤醒了千百万群众，团结了全国的抗日力量，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发动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八年抗战，解决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个胜利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只有解决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推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国今天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第二次革命——改革，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生产关系和有关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贫穷，使人民富裕起来，使国家强盛起来。

四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必须抓住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只有正确地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对客观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只有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或趋于稳定）。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77.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95.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96—297.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4.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16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1.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95.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94.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增刊）

简评 《剑桥中国晚清史》

——对中国历史学的思考

(1986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它以自己独特的编纂方式叙述和分析了起自清朝嘉庆年间、止于辛亥革命，即1800年至1911年的中国历史。该书对我们的吸引力在于它与我国学者编写的这段时间的历史书籍相比所显示出来的特色。

一、专题形式

该书的《总编辑序》指出了这一特点：“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该书编写者把这段时间的历史分成21个专题来编写，以历史本身的逻辑层次为序列。各个专题的专家以自己的专题研究成果为依据，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综合概括，力图揭示每个专题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多重的、深层的联系，探讨其在整个中国晚清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特点，正是该书的优点，值得我国史学工作者借鉴。我国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特别是作为断代史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正缺乏这一特点。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兼容并包

本书上、下卷共21章，即21个专题，是由这21个专题的专家各自完成

的。因此，在该书中有观点互相冲突的地方。这也正如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那样：“本书各章撰者立言也不尽一致。”可以说，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反映了西方学者编写史书的风格。正由于该书的总编和各个专题的撰写者的互相尊重与互相宽容，我们才能在该书中看到这些不一致的观点。在集体编写工作中，能够对各个作者的不同观点兼容并包，是值得赞许的。在我国出版的那些集体编写的史书中，是看不到这种现象的。编者往往要求立言一致。即使有不同观点，也只能各自保留。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我看是个缺点。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参照性强

因为这是一部由大陆以外的学者（其中，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所长郭廷以、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王尔敏）编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所以它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具有参照性。这儿所说的参照性，就是把它与我们已经确立的史实、史论进行对照，看其有哪些是可取的，有哪些向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及信息量的大小。参照性越强，它的价值就越高。《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我们来说，具有比较强的参照性，有许多地方读起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很受启发。这里列举几处：

嘉庆政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上卷，第 114 页）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上卷，第 115 页）

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上卷，第 116 页）

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上卷，第 117 页）

然而，人口的增加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的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的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简而言之，人口和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增长，在中国像在同时期欧洲的某些地区一样，促进了商业化，并且提高了商人的作用。（上卷，第 20~21 页）

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下卷，第 380 页）

下卷第七章的作者对清朝末年的“改革”的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

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下卷，第 459 页）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下卷，第 460 页）

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下卷，第 461 页）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都无关紧要；

说到底他们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下卷，第 462 页）

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下卷，第 463 页）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 1911 年，中国已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被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个因素，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与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下卷，第 513 页）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下卷，第 655 页）

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争。（下卷，第 660 页）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下卷，第 666 页）

像上面列举的这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是很多的。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每个中国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也有待我国史学界作出回答。

四、非线性化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与我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的线性化相比，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特色，那就是非线性化。所谓历史研究的线性化，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着某种必然的规律的运动，人们能够找到这些规律，并且可以描绘出一条或者几条必然性的线索。所谓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就是指历史研究并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历史发展线索，而是力图对历史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研究历史的一切方面、联系和中介，系统地、全面地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既描述并分析了晚清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又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既有对近代中国社会系统结构的宏观分析，又有对深层结构的微观考察；从清政府的内政到外交，从内地到边疆，从改朝换代到社会变化的潮流，从阶级矛盾到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立体的、多层次的社会系统，作者们都各尽其力，作了有价值的分析。读了令人感到该书的内容特别丰富，立体感、结构性、系统性较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部晚清文化史。

在我国的历史研究领域，传统的线性研究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几条线索。由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线性化，特别是强调了阶级斗争这条线索。当这种强调趋向极端时，就把阶级斗争史与历史等同起来，阶级分析几乎成了历史研究的代名词，以至于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把原始社会以后的一切历史现象都解释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对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历史，都用阶级斗争这个模式去套，以至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往往被写成一部革命史、阶级斗争史。经济史主要是政治经济史，思想史也基本上相当于一部政治思想史。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史学界和知识界的普遍不满。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为扭转这种局面作了努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历史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象，特别是在历史教科书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历史专业使用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材）、成人教育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当一部分历史普及读物，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